

杰里米·里夫金：“零成本社会”即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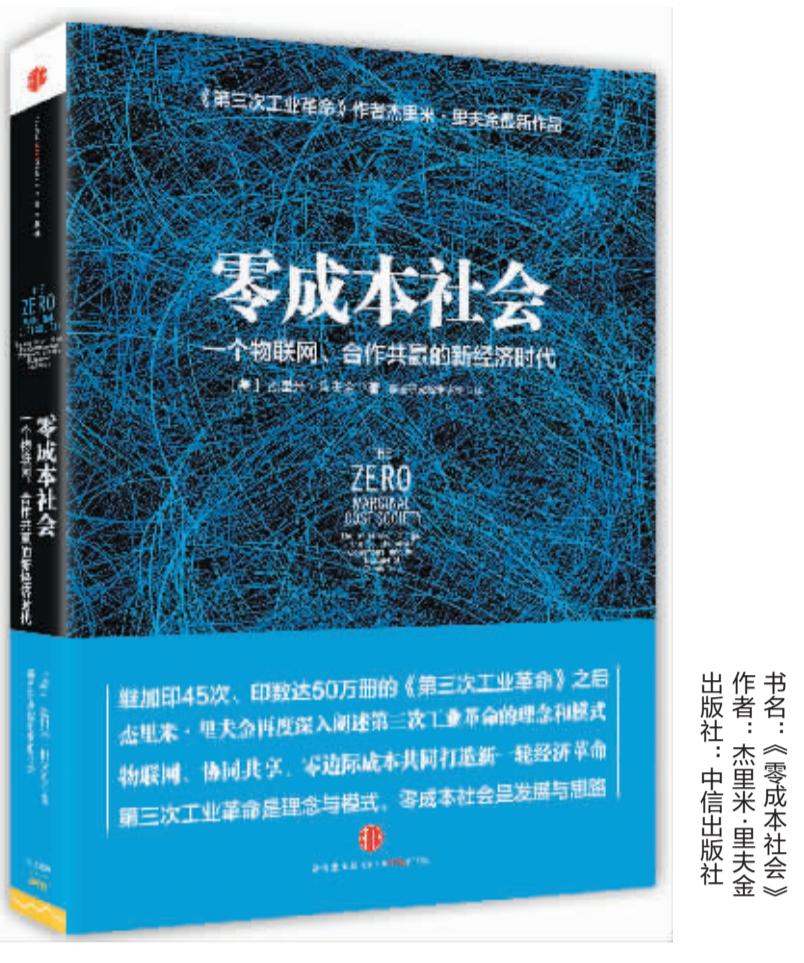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卢铮

畅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身为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他为欧盟和世界多国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担任讲师。近期他的新书《零成本社会》中文版出版。在本书中，杰里米·里夫金为我们绘制了一个由物联网、合作共赢、零边际成本共同打造的新一轮经济革命的蓝图。近期，杰里米·里夫金在北京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采访。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深入阐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念和模式，而其最新力作《零成本社会》则为我们绘制了一个由物联网、合作共赢、零边际成本共同打造的新一轮经济革命的蓝图。书中里夫金系统地做出了关于未来世界的三大预测：协同共享经济将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现有的能源体系和结构将被能源互联网所替代；机器革命来临，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都将消失。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促成了协同共享经济新形式的出现？其中非常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我们生产额外新的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这种边际成本会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接近于零。”里夫金说。他认为，“产消者”正在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制作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娱乐、绿色能源和3D打印产品。他们也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以极低或零成本的模式分享汽车、住房、服装和其他物品；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基于零成本模式的开放式网络课程……

里夫金认为，我们所有的变革主要都是来自于三大变化，这三大变化汇集在一个平



书名：《零成本社会》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台上从而推进了产业革命。这三大变化分别是：第一，通讯交流的变革，新的通讯工具和交流工具，使我们能更有效地改善沟通，并且进行管理和组织；第二，能源和能量方面的变革，通过效率更高的能源，使我们能够更好驱动机械，进行生产。第三，交通方式的变革，新交通方式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运载人和货物。“当这三大技术变革汇在一个平台，才能真正推动历史事件和产业变革。回顾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莫不是这三股力量交织

而来的。”里夫金说。

对于未来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定位，里夫金表示非常有信心。他指出，现在中国信息互联网已经建立起来，能源互联网已经出现雏形，物流业带动交通物联网快速发展，很快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三网融合平台，这会带动中国经济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一旦有了新的产业模式，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创意大国，会成为一个真正在思想上的大国，慢慢成为物联网国家，从而不断迈向零边际成本。”里夫金说。

的结果。”里夫金说。

他认为，从生产力发展上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贡献很可能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从而使人类能以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这个连通性转折点的重要意义甚至可能超过20世纪电气化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以及随之产生的电话、广播和电视的传播。

里夫金分析认为，在数字化经济中，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重要，使用权胜过了所有权，可持续性取代消费主义，合作压倒了竞争，“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取代。他甚至预言，“零成本”现象孕育着一种新的混合式经济模式，这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零边际成本、协同共享将会给主导人类生产发展的经济模式带来颠覆性的转变，我们正在迈入一个超脱于市场的全新经济领域。

里夫金指出，在零成本社会中，通过协同共享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基本商品和服务，这是最具生态效益的发展模式，也是最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书中详述了新兴物联网促成极限生产率、零成本社会和新经济模式形成的细节。这本书解决了企业、非盈利机构和政府在协同共享模式下角色转变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定位，里夫金表示非常有信心。他指出，现在中国信息互联网已经建立起来，能源互联网已经出现雏形，物流业带动交通物联网快速发展，很快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三网融合平台，这会带动中国经济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一旦有了新的产业模式，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创意大国，会成为一个真正在思想上的大国，慢慢成为物联网国家，从而不断迈向零边际成本。”里夫金说。

做个聪明的基金投资者

□王群航

《王群航选基金年度系列》丛书已经出了第八本。从丛书推荐的基金业绩看，其区间整体绩效表现战胜了市场，给投资者带来了较好的选基建议。

截至今年9月30日，按照国家以往的法定分类标准（请看说明），从场外市场投资的角度来看，《王群航选基金2014》书中所推荐的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在前三个季度里的平均净值增长率分别为23.14%、24.65%、10.75%和3.68%，同期，全市场这四大类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2.72%、10.8%、9.91%和3.39%。总体来看，本书所推荐的这些基金区间整体绩效表现战胜了市场。

具体来看，在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里，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绩效冠军都被选入了书中，即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在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里，如果综合考虑规模因素、成立时间、运作期限、业绩的稳定性等指标，书中推荐的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南方现金增利货币、华夏现金增利货币这三只基金的绩效表现也都是显著领先。

在场内可交易基金方面，本书只推荐了

深入浅出地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该类基金所适合的最佳市场环境。

今年8月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其第三十条第四项所载明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其他基金份额的，为基金中基金”，即FOF。目前，市场上正在焦急且安静地等待着监管部门关于FOF产品的实施细则出台。

为什么需要有FOF？截至目前，公募基金的基本数量（以披露了《招募说明书》为统计依据）已经超过了1900只，市场数量（鉴于创新之后基金份额分类和分级的客观存在，以不同分类与分级之后的交易代码为统计依据）已经超过了2200只，这样规模的标的数量，已经同2012年度的股市规模相当。面对如此众多的基金，很多投资者已经开始面临选择基金的困难和疑惑，因此，FOF出现的基础市场时机已经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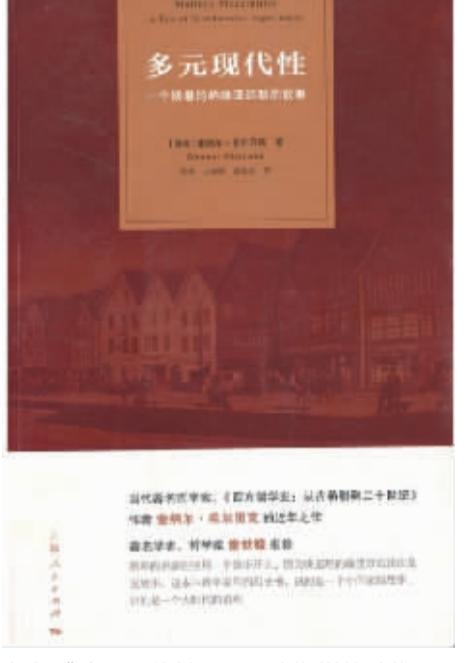
面对未来的FOF，回想每一年的编书经历，实际上就是在做一次又一次的年度投基策略大型报告。今后，面对FOF的实战要求，我们其实不仅要有年度投基策略，还要有半年度的投基策略、季度的投基策略、月度的投基策略。除了这些定期的投基策略报告之外，还要有基于特定市场变化时期的不定期投基策略。

所有这些策略，都可以看成为对于年度大型投基策略报告的修正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基本面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唯有这样，才可以做好投资FOF的基础工作。



书名：《王群航选基金2014》
作者：王群航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外，还要有基于特定市场变化时期的不定期投基策略。所有这些策略，都可以看成为对于年度大型投基策略报告的修正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基本面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唯有这样，才可以做好投资FOF的基础工作。



书名：《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
作者：(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启示

□毛志辉

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经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羡慕的成就，早在几十年前，都已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通过分析以挪威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现代化过程，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多元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被视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案例，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连续历史，理解一个早现代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色在于19世纪路德教官员、大众运动以及精英之间的一种有趣的互动。一方面，官员在斯堪的纳维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大众运动及其精英也获得了独特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中叶成为全面的福利国家，并且对法治给予高度信任。

在书中，希尔贝克提出了三种合理性的基本形式——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他从这个角度入手，专注于从两个时期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一是19世纪挪威立国时期的历史，一是“二战”以后的挪威历史。在这两个时段中，都有所谓作为“理想类型”

的、优秀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在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在“二战”以后的阶段当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则分别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更多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并没有呈现一条径直朝向人人平等、开明和有序的福利社会和民主法治国家的明确必然的发展道路。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过程具备了普遍性和多样性动态交融的特征。由此可以认为，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在事实上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

“多元现代性”是自21世纪初以来就被学术界广泛探讨的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对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即同质化）和亨廷顿强调的“文明的冲突”。而多元现代性观点认为，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唯一真实。

从制度和价值的分化着手，希尔贝克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挪威这三个维度论证了现代性是多元的。他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多而不是一，现代化事业受到各种历史经验与自我批判的反驳与修正。现代化事业就像一个无法回头的持续旅程，却又向着校正与可能的改进开放。而挪威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区别于英美世界以及法国、德国的现代化，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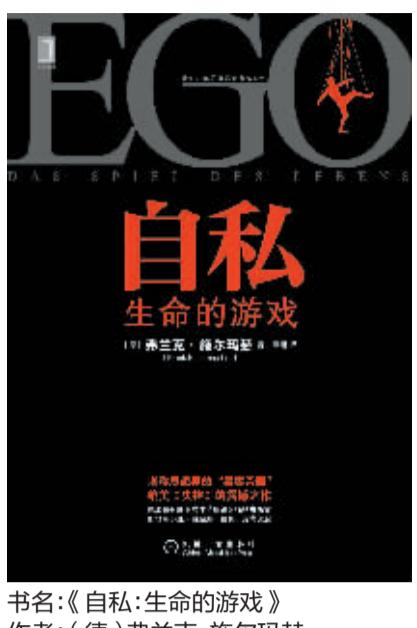
威的经验完全不支持那种把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直线发展的、内生的观点。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同的。这也启示我们，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元的。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非西方国家可能倾向于从自身出发来建构一种与西方现代性话语同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所以不仅有英美的现代化和欧洲各国的现代化，也可以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若以此观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在回顾挪威的现代化经验时，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没有本民族的贵族，其国家官员也是“外来的”，挪威的农场主才是民族传统的代表，挪威的大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赞成现代和启蒙的。同样，在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类似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这些东西解释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所呈现的状况：普遍的福利体系、经济的再分配、相对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公共机构和法治的高度信任。

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简单应用

人会被机器取代吗



书名：《自私：生命的法则》
作者：(德)弗兰克·施尔玛赫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郑渝川

假如我们的大脑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从身体里切下来，放进一个泡满营养液的缸中，通过计算机输送的信号刺激大脑，让它感觉蓝天白云生活一切如常。身体已经腐朽，大脑仍然活跃，这种状态，究竟算是活着还是死去？

如果你回答，单独“存活”的大脑，并不足以代表人的生存，那么又怎么解释而今的数字化生存呢？如果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再进一步，让大脑的信号输出与输入可以脱离人的其他器官，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严格意义上只需要一个大脑，其他器官都只是所谓的冗余。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法则就是理性经济人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理性，可以精确计算，正如行为经济学家所概括指出的，有限理性、厌恶损失、有限意志力、注重公平才是真实的人性。充分理性与自利，只能由技术设计，通过一组组代码、一个个模型来模拟实现。技术演进的速度越快，模拟实现的仿真度就越高，就越能发挥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的优势。美国金融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就大量引入基于先进算法的交易设备，越来越多物理学家、数学家取代了原先的分析师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角。而在文化、公共管理等其他领域，技术、机器、算法取代人（的分析能力、观察能力与处置决策）也已是明眼人可以轻而易举看出的趋势。

随着技术的人工智能的实现程度逐渐提升，上述模拟实现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先前人们不敢想像的技术奇迹。人们需要意识到，既然人只能做到有限理性，无法最完整和准确的反映理性经济人原则，最终人不仅将被剥离大脑之外的存在必要性，而且可以具备人工智能、能够完全理性自利的技术还将取代人的大脑的存在价值，将人彻底淘汰出局。

生命伟大的游戏正在悄悄上演，但人类已经被排除在游戏之外——这就是今年6月逝世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汇报》前主编弗兰克·施尔玛赫生前通过其所著的《自私：生命的法则》一书向人们发出的警告。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在德国引发轰动，被誉为思想界的“黑客帝国”、媲美《失控》的震撼之作，引发了德国及其他多个国家的人们对技术演化前景及相关社会影响的深切反思。

弗兰克·施尔玛赫主要讨论了三个相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理性自利，即自私原则是怎样给一步步从经济学家的假设，经论证放大，成为社会甚至自然演化的法则；二是自私原因如何成为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演进的法则；三是为什么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成批生产出自私自利并在各方面拥有优势的“怪兽”，以取代人的存在。

《自私：生命的法则》书中首先回顾了自私原则被包装成为社会和自然法则的过程。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和企业界为了获得对前苏联阵营的竞争优势，特别是要让西方政治和社会体制、经济模式占据优势，努力塑造清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人是自利的，市场就是真相的机器”。而且，还由美国军方延续二战时的军工体制，编写公式和算法，试图制造出可以替代人的“代理人”，足够理性、可靠、不会感觉疲劳，能够对风险和机会作出高度精确的判断，从而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而经济学家则发展出博弈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并应用到社会各领域，教育人们要用赤裸裸的自私原则来计算一切。

几十年后，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及基本算法）在金融市场的模拟实现，发生了系统错误，引发了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也迫使市场的其他主体，来分摊危机的拯救和治理成本，否则就必然要触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弗兰克·施尔玛赫指出，这种威胁的方式恰恰与冷战时期的核讹诈的威胁方式近乎一致。

简而言之，膜拜理性“代理人”，崇尚理性自利原则，带来了改变了世界的计算机、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和学科的技术及科学成果。而在冷战后，这些成果开始更为集中的应用到最能赚钱的金融领域，掀起了大批物理学家进军华尔街的热潮，他们在后来被称为“宽客”。发明金融衍生品是宽客的一大杰作，也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而在相关的程序、产品开发中，宽客并不需要遵从现有的金融和社会规则，一切都简化为数据、代码和模型组合。

近代乃至更早以前的人们，就在探索自动装置、机器的发明。而在当代，“神经网络”，基于网络技术的智能化运作模式都已经风靡全球。技术与经济思想最为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弗兰克·施尔玛赫指出，几个世纪来许多具有前瞻眼光的哲学家、科学家所担心的事情开始发生，“利维坦”呼之欲出，算法、机器、装置已经可以作出一般人无法辨识清楚的乐曲，自动创作出新闻稿，最为及时的完成资本市场上的操作。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及不断进步，要求人予以适应，然而，就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本身无论如何适应，如何主动异化自我，都很难做到机器、技术所能达到的精确和标准。